

论日本战时体制下中岛敦的文学者姿态 ——再读《山月记》

马英萍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山月记》中的李微在“安史之乱”时期进士及第,他对仕途始终抱有偏离甚至放弃的态度。李微从官吏到诗人、最后变身为虎的过程是一个知识人逐步远离权力中心、自我边缘化的过程。根据“虎”的威武形象和“微”字所包含的“感召”之意,可以将李微定义为放弃正统性的发言同时又具有感召力的文人,而这正是在战时体制下的日本作者中岛敦所追求和显示出的文学者姿态。

关键词:中岛敦;战时体制;山月记;人虎传

DOI:10.3969/j.issn.1671-2714.2014.00.013

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汉学”,在日本国江户后期曾一度达到鼎盛。而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政治、科技、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极力效仿欧洲。在“脱亚入欧”的主流话语下,“汉学”开始衰败,并逐渐演变成一种对中国的“东方学话语”,为日本的侵华战争提供理论支持。^①然而在这样的历史风潮中,日本近代作家中岛敦(1909—1942)一直对中国的古典文学情有独钟。在他33年的生涯中留下了23篇小说文本,其中8篇直接取材或改编自中国古典文学,而从他生前遗留的笔记来看,如果不是过早离世,取材于《韩非子》《荀子》等的小说作品将会相继问世。因此有日本学者甚至将中岛敦定位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汉学传统的最后闪光点”。^②

遗憾的是,我国学界对中岛敦文学研究不够深入,而日本近代文学研究者又由于对我国古典文学和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因此在中国古典文学与中岛敦文学的互文性研究中也显得力不从心。

笔者认为,任何文学文本都包含有历史文化积淀纵向多重的立体结构,同时又是对文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描述或应答,因此以实证的方法,从文化和历史语境入手重新解读中岛敦文学,以丰富我国日本文学研究中的中岛敦文学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以《山月记》为例,在与《人虎传》做互文性研究的基础上,对其深层文本进行剖析,进而揭示作者中岛敦的创作动机,并从一个侧面勾勒出中岛敦的作家形象,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山月记》的取材及《人虎传》 版本的再确认

中岛敦的《山月记》取材于中国古代传奇小说《人虎传》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至于《人虎传》有几个版本,《山月记》究竟取材于哪种版本,我国日本文学研究界鲜有人关注和论及,笔者认为澄清这一问题是对两个文本做互文性研究的先行条件。

收稿日期:2013-09-12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4-03-24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0650-ZK1006)

作者简介:马英萍,女,吉林长春人,副教授,日语语言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① 泊功:《浅论近代日本汉学及对中国的东方学话语》,《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15-22页。

② 新保祐司:《汉学传统的最后闪光点》,见胜又浩·山内洋:《〈山月记〉作品论集》,クレス出版社2001年版,第341-355页。

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成果^{①②③}表明,《人虎传》的故事最早出自唐代志怪传奇小说集《宣室志》,作者张读(834-?)。由于今本《宣室志》未载,所以我们无法得知文本原貌。其后,在编纂于宋初的《太平广记》卷四二七中有“李徵”一文,该文讲述了唐代文人李徵化虎的故事,未署撰人,文末有“出宣室志”字样。而后,在明人陆楫所编的《古今说海》说渊部中载有相似故事,题名为《人虎传》,未署撰人及出处。至清代,陈莲塘辑《唐代丛书》(一名《唐人说荟》)卷二十中收录《人虎传》一文,题撰人唐代李景亮,未注出处。从文本内容上看,此三个版本存在明显差异。如《太平广记》中李徵进士及第的时间为“天宝十载”,另两版本皆为“天宝十五载”;《古今说海》本《人虎传》登场人物为“陇西李徵”和“监察御史李俨”,也与另两版本不同;而《唐代丛书》本《人虎传》的故事结构又与《古今说海》本相近,都有李徵(《古今说海》本为“李徵”)作诗和自述化虎因果的情节。

日本学界普遍认为,中岛敦接触到的版本为大正九年国民文库刊行会出版的,《国译汉文大成》文学部第十二卷“晋唐小说”所载《人虎传》,署“唐李景亮撰”。^④观其文本,与《唐代丛书》本《人虎传》同。故此,笔者认为在与《山月记》进行互文性比较研究时,需选择此版本方有可比性。

二、《山月记》中的时间设置

在《人虎传》与《山月记》的互文性研究中,中日两国学界对这两个文本在时间设置上的差异尚未给予足够关注,而这对于揭示《山月记》的深层

文本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人虎传》中的李徵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春登进士第,“后数年调补江南尉”。^⑤根据唐朝官制,“唐人刚中进士或明经,还不能马上做官,除非再考中制举,或博学宏词,或书判拔萃等,否则需‘守选’等候好几年”。^⑥也就是说,李徵上任应该是及第几年后的事情。而后,他任江南尉“及谢秩”,^⑦也就是一个任期满。“唐人每任一官,都有年限,一般为四年。任满后亦需‘守选’,即在家等候若干年后才能到吏部赴选求另一官”。^⑧其后,他“退归闲适不与人通者近岁余”,^⑨即一年以上没有与人来往。后来因迫于衣食,李徵求得郡国长吏的职位,“在吴楚且周岁”,^⑩而后在归乡的途中发狂不知去向。“至明年陈郡袁修以监察御史奉诏使岭南”,^⑪并在途中遇到了变身为虎的好友李徵。总结上述情节,可得出时间轴如下:

A. 天宝十五年李徵及第进士→B. 守选(进士约三年)→C. 任江南尉(四年或更短)→D. 退归(一年有余)→E. 任郡国长吏(一年)→F. 归乡途中发狂变身为虎→G. 第二年与友人袁修相遇

从上述时间轴可以看出,《人虎传》的整个故事时间应该在八年至十年,其中李徵为官的故事时间为四到五年。与此不同,《山月记》中李徵为官的故事时间大大缩短了,原文如下:

陇西の李徵は博学才穎、天寶の末年、若くして虎榜に連ね、ついで江南尉に補せられたが、性、狷介、自ら恃む所頗る厚く、賤吏に甘んずるを潔しとしなかつた。いくばくもなく官を退いた後は、故山、號略に歸臥

①程毅中:《古小说简目》,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页。

②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34页。

③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60、466-467页。

④在1988年11月由日本近代文学会关西支部组织召开“《山月记》学术研讨会”上,中岛敦研究专家木村一信和鹭只雄指出,在田锅幸信所编中岛敦生前藏书目录中包含《国译汉文大成》系列两册,由此可推断中岛敦阅读过《国译汉文大成》所收《人虎传》。参见:鹭只雄、滨川胜彦、木村一信等,《〈山月记〉研讨会记录》,出自:胜又浩·山内洋:《〈山月记〉作品论集》,クレス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223-224页。

⑤(清)陈莲塘:《唐代丛书第二十卷》,京都琉璃厂藏版同治十年,第36页。

⑥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8页。

⑦(清)陈莲塘:《唐代丛书第二十卷》,京都琉璃厂藏版同治十年,第36页。

⑧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8页。

⑨(清)陈莲塘:《唐代丛书第二十卷》,京都琉璃厂藏版同治十年,第36页。

⑩(清)陈莲塘:《唐代丛书第二十卷》,京都琉璃厂藏版同治十年,第36页。

⑪(清)陈莲塘:《唐代丛书第二十卷》,京都琉璃厂藏版同治十年,第36页。

し、人と交を絶って、ひたすら詩作に耽った。……数年の後、貧窮に堪へず、妻子の衣食のために遂に節を屈して、再び東へ赴き、一地方官吏の職を奉ずることになった。……一年の後、公用で旅に出、汝水のほとりに宿った時、遂に発狂した。……翌年、監察御史、陳郡の袁修といふ者、勅命を奉じて嶺南に使し、途に商於の地に宿った……^①

《山月记》中上述文本的时间轴大致可以整理如下：

A. 天宝末年李微名连虎榜→B. 随后补江南尉→C. 不久辞官归乡，专心作诗→D. 几年后为妻儿的生计再次任地方官→E. 一年后发狂变身为虎→F. 第二年与昔日好友袁修相遇

可见，《山月记》中李微为官的故事时间至多为一二年，而李微辞官作诗所占的故事时间最长。

其次，《山月记》中李微进士及第是在天宝末年(公元756年)，与《唐代丛书》本《人虎传》中所写“天宝十五载”是同一年。正如日本学者小森阳一指出的，“天宝末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隐藏着巨大历史性的时代，这一年正值“安史之乱”(公元755—763)。^②“安史之乱”历经八年，直至唐代宗(公元762—779)在位时期才得以平定，其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局面动荡不安，北方边境时常有吐蕃的骚扰、蜀中有因内江引起的军阀混战(公元765年)、岭南有循州刺史哥舒晃叛乱(公元773年)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乱世，《人虎传》中的李微尽管“性疏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迹卑僚”，^③但他还是耐心地等候守选，并为官至任期满，可以说他为官的意志是比较强的。与此相反，《山月记》中的李微进士及第后便上任为官，但很快辞官归乡，决心要以诗文名扬天下。可以说他对仕途一开始就抱有偏离甚至放弃的态度。

需要指出的是，中岛敦曾于1941年6月就任日本南洋厅国语编修书记，主要负责编修日本在

南方殖民地发行的日本语教材。可以说在日本对外疯狂扩张的年代，这样一个职位对于一个文人来说是获得正统地位、在仕途步步迁升的难得机会。然而1942年2月，《古谭》的发表使中岛敦在文坛获得了一席之地。5月，与《古谭》几乎在同一时期创作完成的小说《光与风与梦》相继在《文学界》发表。此后，中岛敦先后得到筑摩书房为其出版单行本的请求，和《中央公论》的约稿。1942年7月，中岛敦向南洋厅提出辞职，决意此后专心写作。可以说，中岛敦对仕途的淡漠和决心以文立身的人生经历与《山月记》的主人公李微不无契合。

三、《山月记》中李微的不完美诗作

《山月记》中的李微变身为虎后，与昔日友人袁修相遇，并委托袁修为其传录诗作。文中评价李微的诗作“格调高雅、意趣卓逸，一读便知作者文才非凡。然而，袁修一面感慨一面茫然地想：不错，作者的素质实属一流，但这些诗相对于一流作品似乎(在非常微妙之处)还存在缺陷。”^④关于李微诗中的“缺陷”，日本学者提出了很多见解。有人认为，所谓“缺陷”是小说作者中岛敦对自己的文学尚不够完美的一种自我批评。^⑤另有观点认为，“存在缺陷”说到底不过是袁修的感受，袁修以政界官僚的理论否定李微的诗作价值，是极其可悲的。^⑥笔者认为在探讨李微诗作的“缺陷”时，仍应注重《山月记》与原著《人虎传》的互文性比较，根据文本细节的差异做出合理阐释。

首先，《人虎传》中关于李微旧作的评价是“文甚高，理甚远，阅而叹者至于再三”。^⑦“文甚高，理甚远”的字样在《山月记》中被改写为“格调高雅、意趣卓逸”。^⑧显然，《山月记》中李微诗作的缺陷正是“理”。需知“文辞”与“义理”是唐代评价文章的两个方面。在唐代初期秀才科的考试

①中岛敦：《山月记》，见《中岛敦全集第一卷》，筑摩书房2001年版，第22—23页。

②小森阳一：《“摇摆”的日本文学》，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8年版，第242页。

③(清)陈莲塘：《唐代丛书第二十卷》，京都琉璃厂藏版同治十年，第36页。

④中岛敦：《山月记》，见《中岛敦全集第一卷》，筑摩书房2001年版，第26页。

⑤木村一信：《“某些(非常微妙之处)的缺陷”管见》，见《中岛敦论》，双文社1986年版，第198—202页。

⑥长谷川达哉：《〈山月记〉言语分析的尝试》，《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2001年第3期，第37—65页。

⑦(清)陈莲塘：《唐代丛书第二十卷》，京都琉璃厂藏版同治十年，第40页。

⑧中岛敦：《山月记》，见《中岛敦全集第一卷》，筑摩书房2001年版，第26页。

中有“方略策”一项,其评价标准为:“文理俱高者为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者为上中,文理俱平者为上下,文理粗通者为中上,文劣理滞者为不第。”^①另外,唐代进士科的考试设有“杂文”(诗、赋、箴、铭、论、表)与“策问”两项,其评价标准为“文须洞识文律,策须义理惬当者为通”。^②太和年间(公元827~835年),科举考试进行了改革,“杂文”被代之以“议”和“论”,据《册府元龟》载,太和三年八月“礼部奏,进士举人先试贴经并略问大意,取经意精通者次试议论各一首,文理高者便与及第”。^③因此,如果依照唐代科举考试的评价基准,《人虎传》中李徵的旧作“文甚高,理甚远”,堪称完美。而《山月记》中李徵的诗作只是文辞高雅,却缺乏“义理”,最多只能算作“上中”,的确称不上“一流”作品。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山月记》中袁修所谓的“缺陷”是由读者期待与作者创作之间的偏差所致。作为读者的袁修与李徵同年进士及第,与李徵重逢时任“监察御史”,“奉诏出使岭南”。^④据杜佑《通典》,唐代监察御史“掌内外纠察并监察祀及监诸军、出使等”。^⑤值得注意的是,“监察御史”这一官职极其重要,级别虽只有八品,“却不由吏部铨选(吏部掌六品以下官的拟注),例由皇帝敕授”,^⑥唐人晋升监察御史意味着以后仕途的步步迁升。另外,“岭南”这一地名也有极强的暗示意义。我国古代的“岭南”指五岭以南,自秦朝开置南海等三郡以来历代时有叛乱。至唐代,高宗设置“南选”制度,即由朝廷特派使臣(谓选补使)赴岭南等地就地选补地方官,届时派遣一名御史同往监督。^⑦据此,我们可以推断袁修出使岭南的目的极有可能是监督“南选”。

笔者认为,从与李徵同年登科,又在安史之乱动荡时期位登监察御史的袁修的角度来说,他最期待听到的恐怕是李徵关于治国平乱世的意见或见解。需知唐人在科举考试中及第者必须对治理

国家有所见解,因为在唐代的进士科考试中有“策问”一项,要求考生在熟记经典史书的基础上有一定的思辨能力,对社会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或提出解决方案。“策问”的题目多以五道“时务策”的形式出现,例如乾元元年(公元759年)杜甫的《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⑧的第一问为:

……欲使军旅足食。则赋税未能充备矣。欲将诛求不时。则黎元转罹於疾苦矣。子等以待问之实。知新之明。观志气之所存。於应对乎何有。伫渴救敝之通术。愿闻强学之所措。意盖在此矣。得游说乎。

意即现实情况是百姓赋税不足以维持军备所需费用,如果要防备突发战争,百姓就要纳更多的税,生活就会困苦,该题要求考生提出协调赋税和军费关系的办法。诸如此类的“时务策”考试题目在清代董诰等人所编《全唐文》中非常多见。

综合上述,同样是与李徵同年及第,任监察御史的袁修,在《人虎传》中,他对李徵的旧文评价极高,二人在“文”的价值观和创作水平上是一致的、对等的;而在《山月记》中,他感到李徵的旧作存在缺陷,其原因在于身为监察御史,袁修清楚官方的文学评价标准,并不可避免地将这一标准“内化”,期待听到李徵关于治理国家的见解。然而李徵辞官后“与他人断绝交往,一心耽于诗作”,^⑨这样的诗恐怕是缺乏政治性和时局性的。《山月记》这样的改写,突出了“朝廷命官”与“山中野兽”之间的高低位阶差,体现了权力方主流话语对文学的要求与文学家个人创作行为之间的矛盾冲突,而这也正是作者中岛敦在创作时期所面临的局面。

众所周知,芥川奖一直是日本纯文学的最高奖项(与之相对,直木奖是日本通俗文学的最高奖项),获得芥川奖是作家在文坛确立地位的象征。1942年,中岛敦的系列短篇小说《古谭》(初次发表时含《山月记》《文字祸》二篇)以及中篇小

①(唐)李林甫等:《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4-45页。

②(唐)李林甫等:《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5页。

③(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影印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683页。

④中岛敦:《山月记》,见《中岛敦全集第一卷》,筑摩书房2001年版,第23页。

⑤(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74页。

⑥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2-133页。

⑦戴显群:《唐五代社会政治史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169页。

⑧(清)董诰等:《全唐文》(影印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647页。

⑨中岛敦:《山月记》,见《中岛敦全集第一卷》,筑摩书房2001年版,第22页。

说《光与风与梦》相继发表于《文学界》。《光与风与梦》一度被推选为第15回芥川奖候补作品,最终却没能获奖。第15回芥川奖的评委瀧井孝作认为中岛敦的《光与风与梦》“虽然读起来有趣,但文体粗糙,好似翻译作品,不像真正的创作。这位作者的另一部作品是发表在《文学界》2月号上的《古谭》,这部作品有卖弄学识之嫌,我无法对其抱有好奇。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还需要下功夫。”^①小島政二郎则认为《光与风与梦》“对于南洋风物的描写只是文字功夫,缺乏现实色彩。这一点使我感到不足。他的《古谭》虽然很有意思,但不是值得向芥川奖推荐的‘小说’。”^②久米正雄则“虽然知道这是一部优秀强劲的力作,但说不出好坏。”^③最终,中岛敦的小说未被评价为“一流作品”。值得注意的是,瀧井孝作、小島政二郎和久米正雄三人都是“文学报国会”的前身“笔部队”的成员,^④他们都以文人的身份协助过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

另一方面,从芥川奖的获奖作品来看,从1941年第13回芥川奖开始到二战结束前的1944年的第19回为止,芥川奖的获奖作品几乎都与时局相关。1941年上半年的第13回芥川奖获奖作品为多田裕计的《长江三角洲》,描写租借地上海抗日与“亲日”不同立场报社间的斗争,以及汪精卫身边亲日派为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所进行的活动。1941年下半年的第14回芥川奖获奖作品为芝木好子的《青果市场》,以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东京都中央区筑地的果蔬市场为舞台,描写在日本战时统制经济下,为振兴家运而拼命努力的中间商形象。1942年上半年中岛敦的《光与风与梦》一度被推选为芥川奖候补,而最终评审结果获奖作品为空缺。1942年下半年的获奖作品为仓光俊夫的《联络员》,描写卢沟桥事变前后日本报社联络员的工作,通过联络员川岛对同事山口的厌恶,到最终又救其性命的情节来说明人性的微妙。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芥川奖的奖获

作品,其评审意见也各有褒贬,存在分歧。而上述几例获奖作品的共性是,题材都与时局紧密相关。这恐怕正是中岛敦没能获奖的主要原因。

四、《山月记》中的“言志”之“诗”

日本学者木村一信指出,《人虎传》和《山月记》还存在一处值得探讨的细微差别是:《人虎传》中李徵有“旧文数十篇”,而《山月记》中的李徵作“诗数百篇”。^⑤就是说,李徵旧作的体裁“文”在《山月记》中被改写为“诗”。木村本人对这一问题并未给出深入分析与解答,而该问题也从未引起中日学者的重视。那么,“文”和“诗”究竟有何不同,中岛敦将“文”改写成“诗”的用意何在?“文”这一汉字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⑥为:

文,错画也。错当做造。造画者交造之画也。考工记曰青与赤谓之文。造画之一端也。造画者文之本义。彰彰者彰之本义。义不同也。皇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为文。

“文”最初的意思指有纹理和色彩相杂的事物,后面引申为泛指一切言辞、书籍、诗歌、音乐、刺绣、雕刻等等。^⑦即便诉诸文字标记的“文”也有各种体例,在我国最早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中就论述了包括“诗”“乐府”“论赋”“颂赞”“哀吊”“杂文”“史传”“论说”“诏策”“章表”“奏启”“书记”等在内的各种“文”的体例。

《人虎传》中的李徵所做的究竟是哪一种“文”呢?有学者指出,唐文“沿袭六朝余韵,讲究骈体四六文,甚至连表、奏、制、诰、判等公文,全都以骈文书写,或骈、散体交杂”,“到了会昌年间,虽然韩愈等人早已在提倡写古文,但官场上庄重的诏令敕制、书奏表启和判案所用的判文等,还是以骈文为主……即使到了中晚唐古文比较盛行的

①《第十五回芥川奖选评》,见《中岛敦全集别卷》,筑摩书房2002年版,第278页。

②《第十五回芥川奖选评》,见《中岛敦全集别卷》,筑摩书房2002年版,第280页。

③《第十五回芥川奖选评》,见《中岛敦全集别卷》,筑摩书房2002年版,第284页。

④都筑久义:《通向文学报国会的道路:战时下的文学运动》,《爱知淑德大学论集13》1988年第2期,第7-18页。

⑤木村一信:《〈山月记〉论——对于“毁灭”的恐惧》,见胜又浩·山内洋:《〈山月记〉作品论集》,クレス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41页。

⑥(汉)许慎:《说文解字注》,(清)段玉裁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25页。

⑦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时代,唐人一般在考科举和接下来的基层官场生活中,恐怕仍有许多时候需要读、写骈文。李商隐文集里的表状和祭文,几乎全都是骈文,连最普通的书启也喜用骈文。杜牧在大中年间任考功郎中、知制诰和中书舍人时所撰的制诰,也全是骈文。韩愈和柳宗元等人替亲朋故人撰写墓志时,好以古文为之,但这恐怕是当时的例外,因为现传世的六千多种唐墓志,几乎全以骈文书写。”^①可见,骈文这种体例在唐代应用范围极广。并且由此可以推断,《人虎传》中的李徵所作之“文”也极有可能是所谓的“骈文”。

“诗”作为“文”的一种体例,主要用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依据《文心雕龙》卷二《明诗第六》^②: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张立斋先生对此段加注说:“《毛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正义曰:‘诗者,人志意所之适也。虽有所适,未发于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懣,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为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艺文志》:‘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此之谓也。”^③可见,“诗”这种体例主要用于表达作者的胸怀情感,政论并不是诗的主要任务。可以说,《山月记》中的李徵正是受到了“诗”的体例限制,而无法做出袁蓁心目中的“一流作品”。而中岛敦这样的改写恰恰蕴示着他对文学创作意义的理解。

需知,在中岛敦登上文坛的1941年,日本正处于战时体制,许多文人把“奉公报国”当做文学

的主要任务,日本文坛的主流也被所谓的国策文学所充斥。而对于作家中岛敦来说,文学的主要任务并不是附庸所谓的国策。中岛敦在其随笔《在露兜树下》中坦言:“我一直认为战争是战争,文学是文学,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我从没想过要在创作中加入时局的色彩,更没有想过文学可以服务于国家目的。至少从没想过文学可以像应用科学一样对战事有所帮助……凭借文学者的学问和知识而发起的文化启蒙作用,以及文学者的古典解说和报道撰写技术终究可以算是文学的功能么……期待我们当下的感动会立刻体现在作品中的人未免过于性急。担心自己的创作缺乏时局性而赋以国策色彩的做法是荒谬的。”^④

五、《山月记》中李徵变“虎”的意义

《人虎传》的李徵是“皇族子”,^⑤二十岁及第进士,他“恃才倨傲”,^⑥对自己的文才颇有自信。李徵初任江南尉,即江南道某县县尉。据《唐六典》等史料,唐县设有不同的等级,自高至低依次为:赤县、次赤县、畿县、次畿县、望县、紧县、上县、中县、中下县及下县,而一般进士出身者最初的官职为紧、望或上县尉,任期满后最理想的去向是累迁至“赤、畿”县尉,或迁转至中央任“监察御史”。^⑦李徵的好友袁蓁走的就是比较理想的仕途。小说中没有交待李徵任江南道县尉期间留下什么政绩,但从任期满后没有迁升而是归乡这一点看,似乎没有特殊政绩。既无政绩,又恃才倨傲的李徵能令“楚人闻其声固久。及至皆开其馆以俟之。宴游极欢。将去,悉厚遗以实其囊橐”,^⑧恐怕唯一可以凭借的是他的文才。置言之,李徵以文才自恃,可以不受仕途束缚而衣食无忧。然而他过分自恃,甚至不受道德和律法约束。据李徵自诉:“于南阳郊外尝私一媼妇。其家窃知之,常有害我心。媼妇由是不得再合。吾因乘风纵

① 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15页。

② 张立斋:《文心雕龙注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③ 张立斋:《文心雕龙注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38-39页。

④ 中岛敦:《在露兜树下》,见《中岛敦全集第二卷》,筑摩书房2001年版,第22-23页。

⑤ (清)陈莲塘:《唐代丛书第二十卷》,京都琉璃厂藏版同治十年,第36页。

⑥ (清)陈莲塘:《唐代丛书第二十卷》,京都琉璃厂藏版同治十年,第36页。

⑦ 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5-137页。

⑧ (清)陈莲塘:《唐代丛书第二十卷》,京都琉璃厂藏版同治十年,第36页。

火,一家数人尽焚杀之而去。”^①正因为如此,他最终被剥夺了人性,化为异兽,遭到了善恶报应。

与《人虎传》不同,《山月记》略去了李徵“皇族子”的身份。根据李徵自省,其变身为虎的原因是由于“懦弱的自尊心和傲慢的羞耻心。一方面恐怕自己并非珠玑,而不愿刻苦磨练;另一方面,又有几分相信自己的资质,不愿与碌碌无为之辈为伍。因而逐渐远离世事,与人疏远,愤懑和羞恼使自己懦弱的自尊心不断滋长。”^②按李徵的说法,老虎正是外表强悍而内心软弱的象征。然而众所周知,“虎”为百兽之王,在中日两国都是“威武”的象征。我国汉代的武将中即有“虎贲中郎将”的官职,“虎贲”为勇猛迅速之意,此官职负责统领禁卫,保护皇室。唐代从武则天时代开始,四品武将的官服(绣袍)上装饰有虎的图案(文官官服图案为鸟形,武官官服图案从一品至五品依次为麒麟、狮子、豹、虎、熊)。^③在日本,人们对“虎”也有相同的印象。例如日本战国时期(公元1467年~1603年)以勇猛著称的两名武将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即被后世誉为“甲斐之虎”和“越后之虎”。由此可见,变身为虎并非一件“有损于人”的事。

《人虎传》中的李徵任官“及谢秩”,后因“因果报应”而变身为虎。与此不同,《山月记》中的李徵为专心于诗歌创作而主动放弃仕途,放弃接近权力中心的机会,最终却没能扬名天下,而是变身为虎。从官吏到诗人,再到老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知识人逐步自我边缘化的过程。作为山中野兽,老虎是不掌握文字的,它没有办法把自己做的诗记录为文字。而放弃文字就意味着放弃自己发言的正统性,无文字记载的虎的嗥叫只能随风而逝。但另一方面,对月咆哮的老虎又给人以雄壮威猛的印象。笔者认为这与战时体制下,中岛敦的文学家姿态不无契合。

身处战时体制下的作家中岛敦并没有附和文坛的主流,对于中岛敦而言,如不能保持文学的纯粹性,他宁可放弃文学创作。在随笔《在露兜树

下》中他曾经直言:“最近我的想法变得很简单,认为忘却文学,只是一心做好眼前的事就可以了。作为一个国民忠实地生活,在此过程中,如果是文学家也许自然能写出某些作品,但即便写不出也没有关系。眼下,一个人是否成为作家并不重要……文学如果发挥其功效,应该是对当下容易被忽视的我们精神的外刚内柔性——或者说在英勇外表的下面隐藏着思考忌避性,起到一种防腐剂的作用……”^④可见,在战时体制下,为保持文学的独立性,中岛敦随时准备放弃文学创作的道路,而只作为一个普通国民简单地生活。但同时,从他在1942年1月《新创作》的新年号上发表《在露兜树下》这一行为本身可以看出,他期待自己的这种姿态可以富有感召力,可以对其他文人构成影响。

六、《山月记》中文人李徵的感召力

在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一律将《人虎传》的主人公名字写作“李徵”,而我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界在进行《人虎传》与《山月记》的互文性研究时,却大都将两个文本的登场人物写作“李征”。这显然是汉字简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事实上,我国古代有“征”和“徵”两个汉字,古人使用时是加以区分的。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征”意为“正行”。^⑤而“徵”字从字形上看显然包含“彳”(行走之意)、“文”、“山”、“一王”的信息在内,这对文人李徵行至山林化为老虎的情节有极强的暗示作用。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⑥:

徵者,召也。召者,呼也。周礼司市典祀注、乡饮酒礼注、乡射礼注皆曰:徵,召也。按徵者,证也。验也。有证验,斯有感召。有感召,而事以成。故士昏礼注、礼运注又曰,徵,成也……行於徵而闻达者即徵也……言行於隐微而闻达挺之于外。是乃感召之意也。

鉴于“徵”字所包含信息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在探讨《山月记》时应当采用我国古典文学界通用的

①(清)陈莲塘:《唐代丛书第二十卷》,京都琉璃厂藏版同治十年,第40页。

②中岛敦:《山月记》,见《中岛敦全集第一卷》,筑摩书房2001年版,第27页。

③韦霞、秦岁明、廖丰丰:《浅谈唐朝服饰中传统图案的设计》,《艺术与设计》2007年第4期,第143-145页。

④中岛敦:《在露兜树下》,见《中岛敦全集第二卷》,筑摩书房2001年版,第23页。

⑤(汉)许慎:《说文解字注》,(清)段玉裁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

⑥(汉)许慎:《说文解字注》,(清)段玉裁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87页。

表记“李徵”，“徵”音作“zheng”。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与我国古代志怪小说《人虎传》不同，《山月记》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篇近代小说，其“近代性”在于作者中岛敦借小说人物李徵之口道出了自身的内心独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岛敦在横滨高等女校执教的八年间（1933—1941）一直在坚持文学创作。当时是“同人杂志”文学创作团体兴盛的时期，很多著名的作家、评论家早年都参加过各种“同人杂志”。例如梶井基次郎、三好达治加入过“青空”杂志创作，小林秀雄、富永太郎加入过“山茧”杂志创作。而中岛敦是一个例外，他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团体，而是独自一人坚持创作。因此可以说，小说中“与他人断绝交往，一心耽于诗作”的李徵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作者中岛敦的自身写照。^①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山月记》中化为老虎的文人“李徵”还包含有“言行隐微而闻达挺之于外”^②、富有“感召力”等信息，这正与作者中岛敦作为一个文学者所持有的决心和姿态相吻合。

综上所述，1941年登上文坛的作家中岛敦身

处日本战时体制下，面对的是日本军部及内阁情报局对文学界的挟持和绑架。在严厉的检阅制度下，很多作家被禁笔；另有一些作家积极协助所谓的国策，组建了包括“笔杆子部队”（1938年8月成立）、“经国文艺会”（1939年9月成立）以及“日本文艺中央会”（1940年10月成立）在内的各种文学团体。1942年5月，在内阁情报局的操控下成立了文学者的统一组织——“日本文学报国会”，众多文学界人士纷纷加入。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中岛敦坚持应该以文学来做文学，而不应以文学来做政治的观点，对所谓的“文学报国”持有质疑。尽管他也期待能够在文坛确立地位，但为保持文学的独立性，则宁可放弃成为作家。正如日本学者荒正人指出的，在日本战时体制下，很多文人的发言呈现钟摆似的摇摆，而中岛敦是摆幅最小的一位作家。^③笔者认为，《山月记》中的李徵不仅放弃仕途，而且放弃成为正统文人的机会，最后变身为虎归于山野，这正是战时体制下，作家中岛敦所追求和具有的文学者姿态。

Japan's War Time: Rereading of Nakajima Atsushi's *Records of Mountain and Moon*

MA Yingping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chool of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Li Zheng, the hero of *Records of Mountain and Moon*, passed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in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urmoil of Anshi in Tang Dynasty. But his poems were not approved by the mainstream due to a lack of political nature since he always tried to depart from or even abandon his political career. His changes from an official to a poet and eventually into a tiger demonstrated the process of the intellectual's marginalization from power. Li Zheng is the kind of person who abandons the say in mainstream but tries to voice his own inspir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is is exactly what Nakajima Atsushi's stand during war time in Japan.

Key words: Nakajima Atsushi; political system in war time; *Records of Mountain and Moon*; *Legend of Man and Tiger*

(责任编辑 孟莉英)

①新保祐司：《汉学传统的最后闪光点》，见胜又浩·山内洋：《〈山月记〉作品论集》，クレス出版社2001年版，第341-355页。

②（汉）许慎：《说文解字注》，（清）段玉裁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87页。

③荒正人：《战时下的“艺术抵抗派”》，见《国文学：解释与教材的研究》，学灯社1965年第6期，第32-36页。

